

叶兆言散文的学识、趣味、才情

□张宗刚



2020年5月
译林出版社
叶兆言
《陈年旧事》

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叶兆言经典作品”系列，含《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人有》《午后的岁月》六本文史散文，内容多为追忆故人旧事，聚焦近百年文人命运演进，记录中国五代知识分子之精神历程，及个人成长历程与中外阅读经验。作者以简洁朴实之笔，传神勾勒出多位近现代著名人物尤其如梁启超、陈寅恪、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李叔同、黄侃、夏丏尊、穆时英、朱自清、张爱玲、徐志摩等文化名家，读之颇感亲切。

这些年，叶兆言的散文随笔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其下笔长短随意，小大由之，收发自如，犀利俏皮，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我手写我口，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笔耕不辍的技术型作家叶兆言，由此练就八级钳工般的精妙身手。叶兆言的散文取材广泛，无施不可，凡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捡到篮里都是菜。叶氏行文以学养和体验作支撑，侃侃而谈，不为知识、史料和经验、定见所奴役，融学问、见识、趣味、才情于一炉，仿佛与人负暄谈话，抵掌而谈，促膝共语。这份功夫，显然受益于严格的训练和扎实的功底。

在书中，叶兆言以生花之笔，复原了诸多生动人物：已逝的和健在的，陈旧的和新鲜的。“一想到刘半农，我的脑海里立刻就冒出大脑袋瓜和鱼皮鞋。”（《刘半农》）“林琴南翻译的速度很快，颇有些像今日的东方快车软件。”（《林琴南》）这是怎样鲜活生动的小说家语言？作者笔下功夫，大有折冲樽俎以一敌百之势。“高尔基的作品仿佛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仪仗队一样浩浩荡荡陈列在父亲的书橱里。”（《革命文豪高尔基》）“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周氏兄弟》）这样的行文，一似春梦无痕，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从中尽可见出才情、见识、韵致、境界，见出元气淋漓驳杂包容。讲究“辞达”的叶兆言，其行文的随意率性，其实正是五四先贤当年力倡的“谈话风”。

文风即性情。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俨具层峦叠嶂、千手千眼之势，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西方的孟德斯鸠、培根、蒙田、兰姆、爱默生、梭罗、卡莱尔，中国的鲁迅、周作人、梁实秋、钱锺书、王力、唐弢、黄裳，其路数大抵如此。宽泛、自由、开放、包容；琳琅满目的叶氏散文，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充分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糅合平民语调、文人笔墨以至小资情调，成就跨文体写作的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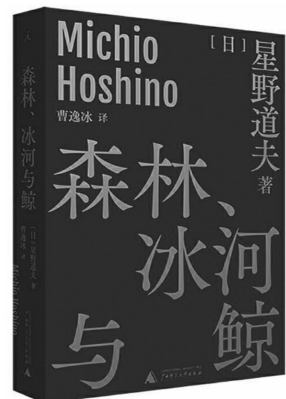
景。叶兆言的文字每每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文字功夫几臻炉火纯青。通过它们，叶兆言努力探讨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力求还原历史人物，揭示人性弱点，借以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叶兆言从个体视角出发，讲述近现代史上诸多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注重第一手文献的运用，从大处把握历史的脉络，随性随心而又考证有据，笔下氤氲着沉静的士子气，弥散着温馨与苦涩。因了叶兆言的特殊家世，这类掌故史迹由他口中道出，格外真切，也格外服人。

《白马湖之冬》写夏丏尊去世后，生前好友组成夏丏尊纪念馆委员会，募集款项用于奖励教学成绩突出的中学国文教师。“可惜这个奖只发过一次，获奖者是姚韵漪女士，随着当时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钱根本就不值钱，奖金已失去意义而无法继续。”以沉郁笔力，表达对时局的感慨，传达出一种苍凉况味。《纪念》是一篇祭父文，写父亲叶至诚少时即流露出写作天赋，然而历尽磨难，半生蹉跎，最终竟未能如愿写出像样些的文字；正所谓墨到浓处无语，情到浓时转薄，其寄意何其遥深沉痛！《周瘦鹃》结尾写“文革”开始后，周瘦鹃在自家花园中投井自杀，为自己的人生画下惨烈的句号。《吴宓》结尾写暮年吴宓在1978年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喊饿了就叫……读来不胜感慨。

叶氏行文散漫而考究，忽而一泄千里，忽而盘马弯弓，生成驳杂交错之美。涉笔成趣的叶兆言散文，融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个人感悟、人文批判于一炉，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历史”散文，亦是“现实”散文；是“公共”散文，也是“私人”散文；是“小”散文，更是“大”散文。

大地知晓一切

□林颐



2021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星野道夫 (Michio Hoshino)
《森林、冰河与鲸》

“大地知晓一切。你一旦犯错，大地就会知道。”科尤康印第安人如此告诫。

这句箴言出现在《森林、冰河与鲸》里，这本书引用了许多类似谚语，其中包含的智慧，大多指向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全书从“渡鸦氏族的后裔”讲起，很多印第安部落和爱斯基摩人都认为渡鸦是他们的创世神。北美最后一条野性之河，塔琴希尼河，在特里吉特族的语言里，就是“渡鸦之河”的意思。追寻渡鸦的传说，意味着，追寻人与世界自古以来的联结。

《森林、冰河与鲸》是星野道夫的遗作。1996年8月8日凌晨4点，棕熊袭击了库页湖畔的帐篷，睡梦中的星野道夫罹难，享年43岁。

这不长的生命，有一半的人生，是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早在1973年，星野道夫就尝试与希什马廖夫村的爱斯基摩家庭共同生活了三个月。26岁时，星野道夫就读阿拉斯加大学，此后，长年居住阿拉斯加，以拍摄北极圈自然风光与人文场景为己任。森林、冰河与鲸，苔原、驯鹿与熊，极光、渔舟与山，星野道夫把镜头对准了深爱的这一切。

阿拉斯加四季分明，并非我们以为的沉寂荒凉。某个瞬间，冰河发出一串“喀嘣”的响声，春潮汹涌，枝头吐蕊，阿拉斯加的春天虽然短暂却极其盛大。这里的自然有一种不停歇的跃动感，这里的季节变换之快，人还没反应过来，新的季节就来临了。

星野道夫擅长自然摄影，他的随笔写得也好，文字清新洗练，真诚质朴。他像孩子那样为美丽的事物而喜悦，又以成人的责任感不断地向世界传递美。除了拍摄、记录阿拉斯加之外，星野道夫还经常回日本做演讲，有时带领中小学生在阿拉斯加实地体验自然的神奇，激发人们的环保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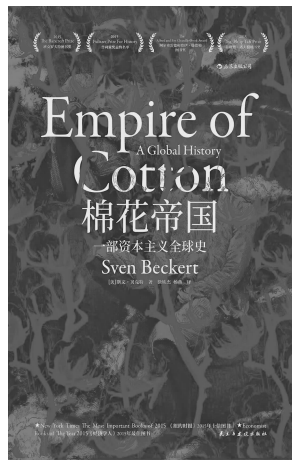
星野道夫为大自然的魔力着迷。起初他打算先努力个五六年，想办法总结出一本以阿拉斯加为主题的影集。结果十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星野道夫扎根在了这块土地上。

对大自然的向往是初衷，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阿拉斯加住着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还有许多从美国本土过去的白人。星野道夫主动融入当地的社交，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他都写在文章里。星野道夫超越了旅行作家和摄影家的身份，更接近人类学家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在那里生活，星野道夫不断邂逅各种各样的人，就形形色色的话题进行深入的交流。

星野道夫“好奇别人的活法”。他觉得，了解别人的生活，也有助于看清自己的生活。19岁那年，他在旧书店里发现一本《Alaska》摄影集，阿拉斯加成了魂牵梦萦的命定之地。21岁那年，挚友在登山时殉难。星野道夫认识到人生是有可能突然截断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这次意外成为履践行动的契机。星野道夫时刻搜寻自己的时间轴，省思人生的意义与幸福的定义。星野道夫了解阿拉斯加，他说露营的时候最需要小心的莫过于熊，很多次，熊来了，走了。最终，他没能避开危险。在阿拉斯加，生与死的风景实在泾渭分明。

棉花如何改变世界

□雷雨



2019年4月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美）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棉花帝国》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斯文·贝克特的一部全球史专著，此书于2015年在美国出版后就引发了广泛关注。除了绪论与结语，还有十三章的篇幅，以宏观的视野，恢宏的气势，而又细致入微的支点，来纵论棉花种植、生产以及它如何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支撑而构建起庞大的棉花帝国。作者在跨度数千年着起三百年的历史烟云中，全局在胸，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棉花何以成为一种世界经济中成功的商品，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开疆拓土冲锋陷阵；详细叙述了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为何能够顺势而为借助于棉花这样看似貌不惊人的寻常植物构建起当今世界经济的南北大分流，而且还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

斯文·贝克特在自己的纵横捭阖举重若轻的叙事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是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在斯文·贝克

特笔下的资本主义，又被赋予了一定的前置词，这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所谓新资本主义这样的三个阶段。战争资本主义是如何被缔造的？他们是如何攫取劳动力与土地？是如何催生奴隶制盛行的？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建立开启了战争资本主义时代，也开始改变棉花的命运赋予棉花以异化的内涵，此后是在美洲的土地疯狂掠夺，对亚洲、非洲的野蛮侵入，跨大西洋商业网络的创建是一次对不同时空的劳力资源的大规模重组，型塑了一个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大环境。毋庸讳言，英国在其中率先崛起，以纺织工业革命为先锋开启了工业革命，利物浦、曼彻斯特、伦敦成为世界瞩目之地。从这个角度来讲，英帝国，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就是棉花帝国。

棉花帝国需要全球性的劳工队伍与全球性的商品交易体制，两者都要求更多的国家更大的人群和社会卷入棉花资本主义体系中来。古老的中国被动扭捏，坚船利炮，不速而至，虽然是被命名为鸦片战争，却把中国纳入了这样的殖民体系之中。但在作者看来，1861年，160年前，美国内战的爆发，终结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棉花帝国，而进入了新棉花帝国主义。作者认为所谓的新棉花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也好，跨国公司也罢，但真正的背后推手是国家的介入。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作用十分明显与重要，因为国家在推进棉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进自身的建构。作者讲述了新棉花帝国主义之后，终结在20世纪30年代，以“全球南方的回归”来作结，也算一家之言。贝克特说自己如此撰述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本书以一种产品的传记为一扇窗，探究关于

我们世界的历史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并重新解释一段影响至关重大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

《棉花帝国》的作者对棉花何时在中国出现，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字中的“棉”，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但大致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宋以前，中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棉花在中国的普及始自元朝，到了1433年的明代，中国的臣民已经可以用棉花抵税，而到了明末，中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包棉布。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斯文·贝克特振振有词地说道，棉花工业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日本、印度或巴西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棉花制造经验，难以获得原棉、缺乏市场或资本，或无法获得现代制造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才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而且几乎所有棉花都在国内制成纱线和布料。相应的，棉花纺织是中国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斯文·贝克特还提到了张謇、郑观应、薛福成、陈炽等，他称张謇为“全球南方诸多思想家的一员”“他们都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不能不提的是，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征引文献资料，长达115页，姑且不论其立论如何，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德国裔学者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